回忆昆明和平起义

乐韶成口述　乐开智整理

昆明和平起义已三十八年。我也早已成了八旬老翁。但昆明和平起义之往事，依然历历如在眼前。兹概述当时所知情况，供关心文史者参考。

起义前的云南局势

1948年淮海战役后，国民党精锐部队丧失殆尽。为了挽救败局，一方面沿江设防，妄图倚仗长江天险，保守东南半壁；另方面积极加强对后方各省的控制，特别是云南地处西南边陲，西邻缅甸，南接越南，是国民党在必要时撤离大陆，通向台湾的重要通道。

但当时的云南却显得动荡不安。“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卢汉，属于地方势力。“中央驻云南警备司令”何绍洲代表国民党中央的势力。这两种势力互相矛盾，摩擦日益加深。为了缓和矛盾，稳定云南局面，国民党政府就需要派人折衷其间，做有关协调工作。

我被认为是最适当的人选。因为从出身来说，我是云南讲武堂的学生，以后又是南京陆军大学的学生；在经历方面，我在滇系部队的第一集团军、六十军任过参谋长等职，又在中央嫡系部队七十一军、中央美资运输处、联勤总部任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参谋长、处长，对昆、何两方我非常熟悉。

1949年二月，我以国防部联勤总部第四补给区第三补给分区司令的身份到达昆明，受到双方很好的接待。作为补给区司令，我受指示：仅补给中央在云南的军事机构和军队的一切给养。因此何绍洲向我密谈，要我按照中央指示办理，卡住卢汉的给养，使余程万的三十六军、李弥的第八军及八个警备团牢牢控制住卢的保安团，从而进一步控制云南全局，使云南成为西南最后顽抗的基地。而卢汉则希望我支持他扩充地方实力，以便与中央军抗衡。因为滇系部队先后调出省外，投入内战后被消灭或起义的不少。卢当时只有四个保安团，不仅军员人数悬殊，而且武器、装备也差，如不大肆扩充，绝难与中央军真正抗衡。

在双方都寄希望于我的情况下，我应倾向哪一方呢？再三思索之后，我认为与卢汉走在一路较为有利。于是我与卢汉共同拟定将保安团由四个团扩充为十六个团的计划。新增加十二个团的兵源和部份粮秣由卢负责解决；武器装备及其他有关物资则由我负责解决。

我先后使用了以下的解决办法：

1、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曾在西双版纳、红河等地设置四个军械库。对于库存的枪枝被服粮秣等物资，我借口运输保管困难，建议中央就地销毁，实际转交与卢汉新成立的八个保安团。

2、将一批可以修好的枪炮，“鉴定”为无法修好，建议就地销毁，实际也转交与卢的四个团。

3、将我从红河等地撤回一个团的全部美式装备也交与卢汉指挥。

4、暗中从中央调滇的弹药中抽拨五百万发机步炮弹给卢。

5、从我直属的专造机枪的“五三兵工厂”拨一千挺机枪暗中给卢。

因此，在短短的两个月中，便实现了保安团扩充的计划。卢汉的地方实力突然增强。

但我的行动引起三十六军军长余程万的怀疑，他向已从南京迁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告发，我因之被召往广州，接受国防部的追查。只是由于我在处理上述物资时曾事先上报，并有蒋介石亲自签发的文件为凭，因而未受追究，不了了之。事后我在广州领得有关给养，返回云南。

难忘的四九年十二月九日

我回到云南是1949年十一月。这时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已开始逃往台湾。形势急转直下。我向卢汇报了所知情况，卢即召集有关人员密商起义计划，并分头进行工作。我负责四·三补给区司令部所属各部的起义部署。

同年12月9日，张群由成都乘飞机到昆明。当天午后三时，张与卢会同召开云南地区的中央和地方军政各部门首脑会议。张要求卢同意中央运兵到滇继续顽抗。卢却在会上骤然发难，将张群、余程万、李弥，军统重要份子徐远举、沈醉等人扣留起来。

当天下午七时，卢通知我参加在其私邸举行的会议，向大家正式宣布云南和平起义。表示决心遵照刘、邓将军号召，拥护共产党，坚决与国民党脱离关系。要保护好人民财产物资，听候接管，并决定向全省人民宣告。卢同时组成“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

我除率领四·三补给区司令部全体官兵参加起义外，并担任临时军政委员会的军务处副处长（处长是卢的军长龙泽汇），继续兼管军队补给事项。

第二天，我又遵卢嘱咐，将12月6日由成都运来的黄金一万两交卢作军费，由他的保安司令部军需处长李炳垣安排开支。这笔巨额黄金起到助长士气的作用。

昆明保卫战

在12月9日扣留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中，以张群、余程万，李弥为最重要。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张群在几天后即在和平起义前由香港来运鸦片的一架外国飞机从昆明飞往香港。

因此卢汉面临的就是如何应付分布在昆明市外的三十六军和第八军了。这两个军因为卢汉突然扣留了他们的军长余程万和李弥，便集结主力从12月16日起向昆明围攻，以致昆明形势渐趋紧张。更因为这两个军装备优良，人数众多，为了泄愤，他们不惜玉石俱焚，孤注一掷。卢汉虽已有十六个团，但因大部份成立不久，训练不够，战斗力很差，虽顽强反击，而包围圈却日益缩小，市内已开始听到枪炮声，情况十分紧急。

这时，临时军政委员会设在五华山，我也迁到那里办公。以后，眼见炮弹不时在市空飞啸，人心惶惶不安，临委会民政处长安恩溥来问我有何良策。我说，解放军尚远在广东，短期内不可能赶来支援。形势虽然不利，也只有坚守，而且必须坚守。

战争又持续了一天，双方伤亡都大，但三十六军和第八军仍积极猛攻，昆明已呈岌岌可危之势。安恩溥问我何以应急？我认为：这两个军所以如此拚命进攻，不外是为了被扣

留的余程万、李弥两人。如果战争继续发展，昆明市几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都将招致不可估量的损失，而余、李不过两条命罢了。这两个人又都是解放军手下的败将，内心虚弱。纵使将他们放了，面对向云南推进的解放大军，必然率部逃窜。这样，昆明之围可解，他们最后也将如釜底游鱼，仍被歼灭。安听后认为这个办法好，既解除目前危机，也不会遗留后患。

于是安和我同上光复楼（卢当时住址）。卢身着美军高级将领冬装接见了我们。安将我的意见陈述后，我作了补充，并说：如果可行，还可提出，他们必须立即率部离滇作为交换条件。卢考虑一会，遂召集有关人员到光复楼开会，作出决定。

第二天（12月19或20日）早晨，就告知余、李，二人立即同意率部离滇。中午，余、李二人被放出昆明市。一小时后，市郊枪声由疏而静。前沿阵地即报三十六军和第八军已开始撤离。次晨，昆明市内、郊外已闻不到火药味，历时数天的昆明保卫战结束了！

李弥、余程万撤到蒙自后，二人便乘飞机到台湾去了。他们的部队以后多被解放军歼灭，少数残部逃入缅甸。

为云南人民迎来真正的解放

昆明解围后，卢即派人前往广州欢迎解放军来云南接管。我也命所属各处部厂队准备移交工作。

1950年三月，陈赓将军率四兵团入云南，进驻昆明，成立昆明军管会。从此，云南人民得到真正的解放，欢庆日月换新天。

1987年7月31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崇大新支队安顺区队的战斗回忆

黄　建　治

一、初　期　活　动

安顺场是崇庆县南门外二十多华里人称干江坝的一个偏僻乡镇。这里的农民终年过着极度贫苦的生活。

抗日战争时期，约在1942年左右，青年学生戴万泽、黄建湖两人在安顺场组织“青年 励 学会”，宣传日救国。参加的人员大多数是安顺场附近的青年学生。笔者经戴万泽介绍，也参加了该会。

由于思想进步，宣传抗日，戴在安顺小学的校长职务于1943年被反动政府撤销，于是只好去大邑县安仁小学任教栖身。1945年冬，他同黄建湖又一道参加了大邑县青年学会。该学会是1939年寒假由中共地下党员刘家言（中共成都市委西城区书记）倡议组办，由进步知识青年肖汝霖（1947年入党，1948年10月被大恶霸刘文彩杀害）筹建起来的，是一个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

二、党的　领　导

1948年夏天，肖汝霖来到安顺场，住在黄建湖家里。他说：“现在全国形势发展很快，我们要积极起来搞武 装 斗争，要千方百计地把群众发动起来！”于是黄建治遵照肖的嘱咐，采用个别串连的办法，当年即先后把贫苦 农 民黄建平、陈朝福、陈朝品、王小全、陈吉轩、黄维章、亢德民、

黄裕通、陈安民、王青云以及黄福如等十一人发动起来。黄建治、黄福如变卖了田产，买枪枝弹药发给他们。

1948年10月肖汝霖同志牺牲后，王愈文（地下党员，现在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工作）把从肖汝霖家突围出来的李维嘉（川康特委委员，川西地下党负责人，现在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省文联党组书记）同志，护送来崇庆安顺场黄建治家，并交待说："你们一定要把他保护好！他的行动你们不要过问。对外只说是黄建湖的同学，请来给黄建治、黄素媛补习国文，准备将来考大学的。"李维嘉在黄家住了两个多月后，由于特务追捕，情况紧急，黄建治才将李维嘉护送转移到戴万泽家以保安全。

1949年元月上旬（农历腊月初），为了把安顺小学建成党的工作据点，在李维嘉同志的指示下，戴万泽、黄建治找到易毓仙（县参议员），对易说：安顺小学校长雷××在学校里打牌、抽大烟，不宜再继续任职。并推荐黄建湖接任校长，易当即表示赞同。

1949年元月下旬（农历正月），党组织派党员杨太德、高绮琴来安顺小学工作。继后又派陈万堂、段贵纲、李安润、李唯实等几名地下党员来安顺场加强领导武装斗争。这样，安顺小学就成了我党的一个工作据点。

1949年夏天(农历六月)刚放暑假，党组织决定在安顺小学举办地下工作骨干人员培训班，由陈万堂、段贵纲、黄建湖、王寿堂等人负责，参加学习的人员都是追求进步的青年知认分子。学习的内容有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反对自由主义》，刘少奇的《修改党章的报告》及《整风文献》、《土

地改革法大纲》、《怎样做群众工作》等。

学习结束后，成立新民主主义实践社（简称实践社）。主要成员有：黄建湖、黄素媛等三十余人，他们大部由组织上分配到各地开展工作。陈万堂、段贵纲、黄建湖、黄建治、黄素媛、王兰芳、肖伍瑛、黄福如、戴万泽等则仍留在安顺场继续发动群众。以挖穷根吐苦水、吃血酒、打十姊妹、麻饼子会等方式，把农民组织起来，先后发展了数十人参加秘密武装组织。武工队员中又互相串连继续发展，到打“二五减租”暴动时，已有武装六、七十人。暴动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疯狂镇压，为了保存力量，我们分散转移。采取推磨子的游击战术与敌周旋于崇庆县的安顺、隆兴、中和、牛皮等场和大邑县的重兴场、董场等地。在这些地方又继续发展了地下武装数十人。经段贵纲、黄建治的介绍，由陈万堂批准，吸收了杜成舟、游光仁、何循良、李泽远、何正伦等为新民主主义实践社成员。

1949年12年中旬（农历十月二十几），上级党组织通知我们到大邑县安仁镇李育之（文彩中学董事长）家参加紧急会议。会议由陈万堂主持，学习《游击队的战略战术以及作战任务》，宣布崇（庆）、大（邑）、新（津）支队正式成立，王汉卿任支队长，陈万堂任政治指导员，黄建湖任副支队长，黄国福、杨太德任副政治指导员。由支队领导人决定各区队的负责人员。会议结束后，陈万堂、黄建湖、段贵纲、黄建治、黄素媛、黄福如等回到安顺场，在黄建湖家召开秘密会议，成立安顺区队（区队长黄建治、指导员段贵纲），并任命下属各乡游击大队的负责人：安顺大队队长黄福如，副大队长陈吉轩；隆兴大队队长许维忠；王场由卓朗

天负责；中和乡由杜舟成负责：牛皮乡由李 泽远 负责；蔡场、董场由杨太德、梁春发负责。

三、组 织 机 构

安顺区队生有游击队员三百多人，是崇、大、新支队的主力。区队部设在安顺小学内，除队长、指导员外，由黄素媛、王兰芳、余子贵、张俊德、李竹英担任宣传工作，黄子渊、陈吉鑫管理钱粮。

安顺乡游击大队下设八个小组，第一组组长陈安民，第二组组长陶吉盛、罗烈臣，第三组组长张家成、张元清，第四组组长黄子渊、陈炳鑫……

四、作 战 情 况

安顺区队的作战任务是：配合解放军作战，队自为战，就地出击，牵制敌人，给解放军送信带路。下属各乡游击队则以乡为单位集中作战。

1949年12月20日清晨，（农历冬月初一），有枪炮声从大邑苏家乡方向传来，我们知道解放军已经开始向敌军发起进攻了。集中在紫竹庵、八正祠、黄家院子的游击队员立即向苏场方向侦察。约在上午10点钟左右，发现几十个敌人从马沟边小路上溃退下来，游击队员开枪阻击，遭到敌人顽抗。激战约半个小时，敌军改道逃窜。后被集中在杨水碾的游击队前后夹攻，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敌人举手投降。这次战斗生俘敌军数十人，缴获步枪几十支，游击队员付吉轩受伤。——

12月21日（农历冬月初二），敌军官兵数十人从天王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侧败退过来，游击队员前去阻击。敌人已成惊弓之鸟，战斗一打响，敌人就全部缴械投降了。这次战斗生俘敌军官兵数十人，成都中央军校中将教育长李邦藩也被俘。

12月23日（农历冬月初四），国民党部份溃军逃窜到牛皮乡孙河坝渡口，被牛皮乡游击队阻击。战斗一个多小时，因我方利用有利地势，将敌军阻在渡口，解放军听到枪声，追至孙河坝，迫使敌军全部缴械投降。

12月24日（农历冬月初五），隆兴乡游击队员报告：国民党溃军约一个营，被隆兴乡游击队包围在谭家院子。得到报告后，由黄建湖带领几十名游击队员前去支援。经过谈判，敌军全部缴械投降。

12月24日（农历冬月初五），游击队员来报告说，一股国民党溃军由中和乡向安顺乡逃来。我们马上集中几十名游击队员，在安顺小学侧边的树林里埋伏阻击。溃军一到，战斗就打响了。敌军仗恃人多，用冲锋枪、枪榴弹向我阵地攻击。经过几十分钟的激烈战斗，发现敌人越来越多，游击队的处境非常危险。我们采取果断措施，以原编好的战斗小组，利用黎河、黄沟等有利地形，很快地撤退转移到黎巷子、黄家院子、八正祠、安顺小学、石滚堰、陈家林等地。采取麻雀战术，与敌人周旋。敌人摸不清楚虚实，终于被游击队牵制住了。第二天解放军大部队赶到，敌军即全部被歼。

12月26日（农历冬月初七），游击队员40多人，到大邑县高山镇配合解放军阻击胡宗南残部。这次战斗中游击队员郭兴发阵亡，刘长安受伤。

安顺区队配合解放军作战，先后生俘年军官兵总计100

余人。缴获小炮两门，机枪、步枪、冲锋枪等为数也在百支以上。

支队杨太德，秦世禄和区队指导员段贵纲等同志，利用战斗间隙，集中游击队员在大邑县董场老宝寺进行整训，以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和战斗能力。游击队员每次战斗结束，都要以小组进行总结，使作战技能不断得到提高。

解放战争胜利结束，接到上级通知：安顺区队随支队一道去邛崃县桑园镇机场与解放军会师，共同庆祝解放。

1950年元月四日（农历冬月十六日）解放军30部军事代代张敏（政委）率队接管崇庆县城。地下党组织派陈万堂同志与张敏取得联系。在区队里共调了二十名游击队员到崇庆县公安局工作，黄建湖任公安局长。

崇庆县解放后，游击队建制宣布撤销。游击队员一部分编到公安局，一部分编入区武工队和警卫营，大部分则回乡生产。干部有的调县委，有的调区公所工作。区队还保送黄福如、余子贵、陈安民、王万成、张俊德、张绍文等同志到温江地干校学习。

1950年2月11日（农历腊月二十五日）土匪叛乱。原区队游击队员在县委、县府统一领导下重新投入战斗，配合解放军平叛剿匪。当时游击队的任务是：捕捉城内暗藏的匪特，维持城内治安。我们得到可靠情报，很快就把暗藏在城内的匪特杨静辉、代大鹏等捉获，并将他们埋藏的枪枝全数挖出，消除了隐患。

1950年2月12日（农历腊月二十六日）下午，叛乱土匪开始从西门进攻县城。被守城解放军和武装公安击退。第二天我们派一部分队员上城墙配合解放军守城，与土匪激战了

几个昼夜。

1950年2月16日（农历腊月三十日），解放军救援部队赶到，将攻城土匪击溃。守城解放军和游击队开出城外，将土匪围歼于西河坝。这次战斗共击毙叛匪60多人，活捉数百人。

1950年2月17日（农历正月初一），由茹彬（解放军政工队干部，后任过崇庆县委书记）、段贵纲、黄建治率领安顺区队出东门清剿叛匪。在金鸡乡、牛皮乡、三江乡等地配合解放军将叛匪高××、张善其、李泽儒（李麻子）、甘福兴等击溃。正月初五回城，随即与张敏政委一道去元通镇、怀远镇、万家乡一带清剿黄光辉（川西大恶霸之一）、雷少华等匪部。经过多次艰苦的战斗，终于平息了土匪叛乱。

在战斗中游击队员陈保山阵亡，李海青、刘泽武、黄涛、何××、赵纪祥、周中甲、杨华昌、黄绍义等同志牺牲，王益民同志受伤。

上述各节虽均为笔者经历过的事实，但仅系个人回忆，错漏之处，在所难免。希当时参加过斗争的同志予以指正。

（注一） 黄建湖、黄福如也变卖田产购买枪枝子弹，发展地下武工队员。

（注二） 新实社的成员有肖国珂、肖国铨、肖国琼、肖伍瑛、张淑贞、许维忠、许维华、杨淑贞、高绮琴、罗惠明、李竹华、王寿生、王万成、姜润康、廖松林、刘月云、张士林、张士传、黄建治、王兰芳、何玉畴、代万泽、何循良、王明渊、王治才、黄福如、杜成舟、游光仁、向茂文、侯建业、李泽远、李治全、叶和森等。

1986年4月

随军抗战见闻

——纪念“七七事变”五十周年

魏煜焜　　魏晓渊

“七七”芦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开始。继“九一八”、“一二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一举灭亡中国。一九三七年六月起，日本侵略军在北平（今北京）西南宛平县附近连续举行挑衅性军事演习。七月七日夜，日军借口一个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城搜查，并要中国军队撤出宛平等地。这些无理要求遭到中国军队的拒绝。日军悍然炮轰宛平城和芦沟桥。当时驻军第二十九军官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推动下，毅然决然地奋起抗战。七月八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抗战。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才于七月十七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对日抗战。

笔者时在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属下工作（当时魏晓渊任四十五军一二五师连长、营副，魏煜焜任四十一军一二四师连长、参谋），兹仅就随军抗战所知情形作一概述。甚望亲身参与者补所补充和指正。

一、随军抗战经过

一九三七年九月，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副司令孙震）之四十五（军长邓锡侯兼任）、四十一（军长孙

震兼任）两军各部队陆续由成都附近开拔，从北道出川。十月三日，四十一军部队到达宝鸡，转乘火车到西安，四十五军部队继后到达。沿途各站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手持彩色旗子，高呼“欢送川军抗战杀敌”口号，高唱抗战歌曲，并赠送锦旗及大批鞋袜、毛巾、茶具等慰劳品。热情洋溢，使官兵异常兴奋和鼓舞。在西安火车站稍事休整，即奉命东开潼关，北渡黄河，倒太原归入第二战区战斗序列。

原在川军中，这两军部队的武器装备至为窳劣，更没有骑兵和炮兵。轻重机枪和步枪都是四川土造，质量差、数量少。每师只有几门迫击炮和十余挺轻重机枪。时值秋风萧瑟，士兵每人只有粗布单衣两套，绑腿一双，单被一条，小草席一张，草鞋两双，斗笠一顶而已。当部队出发之前，军领导曾经电请中央换发武器，配发装备。蒋介石的复电是：到西安后拨付。殆见到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时，而蒋却说，“二十二集团军已划归第二战斗序列，武器装备应由太原阎长官配给”。及至见着阎锡山时，阎又说他只管山西部队，山西以外的部队应由中央直接负责。嗣后找到负责指挥中央嫡系部队和山西以外杂牌部队的第二战区副长官黄绍雄，黄则说他只管指挥作战，不管后勤事务。就这样推来推去，川军的武器装备竟然得不到换发与补充。而阎锡山在稍后还致电蒋介石说：川军武器装备太差，不能打仗，要求调走。

在山西，我军首次参加了晋东战役，随后因战局需要，辗转开赴鲁南、苏北、豫南、鄂北等战场参战。兹将各次战役情况、撮要记述于下：

（一）晋东战役

一九三七年十月，我军参加晋东战役。四十一军各部队奉命归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指挥。限令部队到达后，一律在阳泉下车。不拘是一团还是一营，到后即驰赴娘子关南侧的鱼口镇一带，阻击日军的迂回部队，并在上下龙泉附近，掩护主力撤退。从十月下旬至十一月上旬，两个星期的作战，部队官兵就伤亡近半数，没有一个完整的师、旅、团、营，有的连队只剩十来个人。为了利于尔后作战，军长孙震集合全体官兵，把部队加以整编，每旅原为两个团的，合并为一个战斗团，腾出一个空团的干部回川向川北师管区去接领新兵。

四十五军之第一二五师，初则受令在闻喜、侯马集结待命，继又北进扼守洪洞、沁源一线，并派一二二师向平遥进击，击溃敌方游击部队，将平遥城收复。

我军在山西抗战，时间虽短，损失却大。当时官兵心里都有三个痛心、一个敬佩。三个痛心是：①痛感到了战场，军师旅团各级连一张作战地区的军事地图都没有，通信器材也极为缺乏，不但敌我态势不清，就是自已部队的位置和行动也不明白；②痛心各部队陆续到了山西，在敌我情况一无所知的当儿，便被分割使用上去，招致被敌各个击破；③痛恨日寇在平定县属之东回村与我作战时，日寇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违反国际公法，动用了毒瓦斯，致使我有一连官兵几乎全部中毒，生还者不过一二十人。损失虽然惨重，但我川中健儿怀着一片爱国热忱，毫不退缩。一个敬佩是：当听到武器装备最差的八路军于九月二十五日在平型关出敌不意，一举歼灭日寇板垣师团千余人，取得了中国军队首次击败日寇的光辉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时，官兵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无不由衷敬佩，感奋不已。

（二）滕县及其外围浴血战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因津浦线吃紧，徐州告急，二十二集团军奉令东调徐州，改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遵照李宗仁的命令，四十五军北开滕县、邹县间布防，四十一军集结于单县、渔台一带。

一九三八年一月中旬，日寇增兵占领了滋阳、曲阜、邹县。四十一军奉令北开滕县附近；原在滕、邹间地区之四十五军部队，则于香城、界河之线占领阵地，与在峄山、两下店一带之敌相对持。三月中旬，日寇以两个师团的兵力、配以飞机、坦践，对我在界河、香城之线发起攻势，我两军部队凭既设阵地，拼死抗击。激战三日，我军伤亡重大。

三月十五日，日寇大量增兵向我方攻击。但我界河正面阵地仍未被突破，龙山、濮阳山阵地亦仍在我手。于是敌复以万余人的兵力由龙山以东延翼向滕县方向右旋迂回。下午五时许，敌先头部队已分别到达滕县东北十多里地的冯河、龙阳店一带。十分明显，敌之企图是在撇开我正面阵地，而直攻我战略要点的滕县城，迫使我正面阵地不战而弃。此时，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奉命固守滕县。守城部队为一个团部、三个营部、十个步兵连和一个迫击炮连，另有师旅部的四个特务连，还有临时来城领运弹药的一二四师的一个步兵连，共约二千五百人。此外，滕县县长周同所属的武装警察和保安团队约五六百人。合计起来，城中共有武装力量约三千人，但真正的战斗部队尚不满两千人。滕县城处于十分危急状态。

十六日上午八时许，敌寇开始向滕县城攻击。王铭章师长抱着“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决心，率领守城官兵拼死抵抗，并奉命把城外所有的四十一军部队统统调进城内。是日敌寇连续攻击七次，均被打退。敌我双方伤亡均大。

十七日上午六时许，敌寇以五六十门山、野炮的密集火力开始攻击，同时敌机二十余架临空低飞，投弹扫射，一时烟尘弥漫，墙倒屋塌，爆炸之声震天撼地，全城一片火海，遍地都成焦土。敌炮轰击两个多小时后，把我方阵地轰开许多缺口，于是以十几辆坦克掩护步兵冲锋。我官兵都抱着血战到底的牺牲精神来对付敌寇。在一阵的手榴弹投掷之后，接着就是白刃交手战。有整连整排全部为国捐躯的，战斗激烈实属空前。到了黄昏，我方弹尽援绝，官兵伤亡殆尽，无力反击。至此，滕县城关被敌占据了东、南、西三面城墙。直至十八日午前，滕县沦陷。在此之前，王铭章师长眼见王麟团长等陆续英勇牺牲，援军又迟迟不到，清醒地明白最后报国时机已到，乃决然向军长孙震发出电报，表示：“职决以死拼，以报国家”。

十六、十七两天以来，滕县落下的敌炮弹达三 万 发以上，守城部队自师长王铭章以下死伤五千多人。而在滕县以北界河、龙山一带作战的四十五军各部队，自师长陈离以下伤亡亦几相等。

此次战役，我军以劣势装备与实力，抗击绝对优势之顽敌，独能浴血奋战，不怕牺牲，挫敌凶峰，阻敌锐进，使我各处援军，得以适时赶到指定位置，既为台儿庄大捷打下基础，也使战役中心之徐州得以转危为安。

（三）转战豫南鄂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